

从红军长征胜利把握“党的清醒和坚定”

王以第 沈浩*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山东 潍坊 261053

摘要: 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具备强大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保持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能够及时发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做到了在身处顺境时保持清醒, 又在面临逆境时更加坚定。90 多年前, 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这“六个始终”, 才能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关键词: 红军; 长征; 党的建设

Grasping the “Party’s Clarity and Firmness” from the Victory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Yidi Wang Hao She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Second Medical University, Weifang, Shandong, 261053,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onsistently “remained true to it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founding mission”, “united in thought, will, and action”, “demonstrated strong leadership capability and governance proficiency”, “maintained a driven and enterprising spirit”, “been able to promptly identify and address its own shortcomings”, and “upheld a clean and upright political ecosystem”. These “six consistencies” have enabled the Party to remain vigilant in times of prosperity and grow even more resilient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More than 90 years ago, it was precisely by adhering to these principle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Red Army to the great victory of the Long March, ushering in a new pha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words: the Red Army; the Long March; Party building

0 前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要想始终赢得人民拥护、筑牢长期执政地位, 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以“六个始终”来衡量、审视红军长征胜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却是相当契合、自洽。论文即从党的领导对长征胜利所起的作用尝试作出新的阐释。

1 “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信仰之基

1.1 内忧外患、水深火热

近代以来, 中国是受殖民侵略危害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列强发动一次次的侵华战争, 数十万、数百万的中国人被屠杀; 通过 700 多个不平等条约, 从中国勒索巨额战争赔款; 在中国设立“租界”, 行使治外法权, 中国主权丧失殆尽。更为严重的是, 列强勾结中国封建地主阶级, 扶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座大山”。广大农民深受地主的剥削, 难得温饱, 遇到灾年甚至卖儿鬻女; 在城市, 几百万产业工人遭受着世界上最为沉重的奴役和压迫; 先天不足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受到“三座大山”的三重挤压, 举步维艰。除了经济上的苦难, 中国的劳苦大众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

1.2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初期,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并将其分解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个阶段。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 表现在红军长征时期, 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围剿”。红军在大方向上向北向西的长征, 具有打破蒋介石“围剿”和北上抗日的双重使命, 而打破“围剿”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只有突破“围剿”生存下来, 下一步才谈得上抗日。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任务, 红军首先付出惨痛代价(约 27 万人牺牲), 更重要的是, 党和红军通过战略上的运筹, 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抗日战争的胜利, 意味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的完成, 距离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总目标更近了一步。

2 “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力量之源

2.1 坚决维护党的权威和统一领导

长征时期对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威胁最大的无疑是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1935 年 6 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

方面军胜利会师,双方抱团取暖本来是一件利好之事,但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把对方的疲惫之师不放在眼里,妄图另立中央、攫取最高权力。党中央运筹帷幄,正如遵义会议之前需要几次会议作铺垫酝酿一样,这次同样通过先后召开毛尔盖会议、俄界会议等解决问题。在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斗争的过程中,此时毛泽东的个人地位虽较之前已有明显变化,但他极为注重发挥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作用,重大决策都由政治局会议统一形成,严格履行必要程序。此外,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毛泽东在诸如张国焘觊觎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挑战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等事关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决予以抵制,坚持了政策的原则性;同时为了促成红军北上,出于维护全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对张国焘反复进行细致耐心的批评教育,作出很大的妥协让步,体现出高度的灵活性^[1]。

2.2 各路红军密切配合协调行动

长征前各路红军分别诞生于不同的根据地,相对独立。长征开始后,遵照党中央和红军总部命令,各路红军纷纷进行战略转移,这为各部队在不同方向、不同地点互相配合和牵制敌军提供了条件。比如,从战略层面看,1934年7月,红七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与闽浙赣根据地的方志敏一部会合,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北上;同年8月,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开始西进;同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转战西北。三支部队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策应主力红军长征的重大任务。在战术层面上,以“四渡赤水”这一经典战为例,毛泽东为了调动对手、甩掉追兵,时而展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时而指挥红一方面军表露向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声势,与强敌巧妙周旋,从而赢得主动,化险为夷、绝境逢生^[1]。

3 “始终具备强大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是胜利之本

在历时两年的征程中,党和红军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从全局角度和战略高度作出了许多非常出色堪称经典的决策,如赣南突围、通道转兵、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凉山结盟、草地脱险、陕北落脚等。下面仅择有代表性的两例予以说明。

3.1 促成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红军欲抗日首先必须确保自身的生存,自己能否生存则取决于反“围剿”能否成功。党和红军的策略调整是围绕“结束内战、一致对外”而展开的,即迫使蒋介石集团调转枪口,从此前的对准红军改为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党和红军为此打出一套组合拳:把红军实质抗日和宣传抗日有机结合起来。先后把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整合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把红二十五军重组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公开发表《北上抗日宣言》等文件,辅以各种标语口号,对沿途民众、国民党士兵等展开宣传攻势,尤其是《八一

宣言》的发表,在国内外、党内外、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和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则明确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2 立足陕北,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红军长征本来起因于丧失原有的根据地,终结于建立新的根据地。在某种意义上,长征可以被视为党和红军不断寻觅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过程^[1]。长征途中,各路红军先后建立了湘鄂川黔、黔西、鄂豫陕和川陕(川康边)等根据地,而最终党和红军选择在陕北落脚,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从必然性来看,毛泽东和党中央通过综合中国革命形势变化、敌我力量对比、沿途民族状况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进行系统思维,决定在川陕甘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1];从偶然性来看,在哈达铺发现的旧报纸使毛泽东获悉陕北存在苏区、活跃着一定数量的红军,从而决定扩大陕北既有的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新中心,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

4 “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是精神之柱

1928年5月4日,毛泽东曾适时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论文仅择其二阐述如下。

4.1 武装斗争

据统计,红军长征期间,共进行各种战役战斗600余次,而包括湘江战役、突破乌江、四渡赤水、遵义战役、嘉陵江战役、土门战役、抢渡金沙江、千佛山战役、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袁家沟口伏击战、包座战役、腊子口战斗、劳山战役、绥崇丹懋战役、百丈关战役、直罗镇战役、便水战斗、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岷洮西战役、甘南战役等比较重要的战役战斗20余次。在这些战役战斗中,参战部队既有中央红军,也有其他部队;敌人既有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有地方军阀手中的杂牌军;既有红军主动出击,也有被动迎敌;既有大的战役,也有小的战斗,有的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意义非凡。

4.2 发动群众

针对长征沿途群众基础薄弱的问题,红军一边行军、一边宣传革命主张革命道理。为维护群众利益,增强宣传效果,红军沿途不断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群众及时改变对红军的片面认知,改善了军民关系。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复杂性,党和红军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宗教政策,做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指导当地群众开展正确的阶级斗争,避免出现“左”的倾向。据统计,长征途中红军创建了多个规模大小不一、存在时长不等的根据地,为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创造了良好条件。虽然长征途中戎马倥偬、敌情不断,党和红军仍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使群众工作

较好地配合了打仗这个主责主业^[1]。

5 “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重生之路

5.1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党、红军和革命带来全局性的危害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着力总结经验教训,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可惜矫枉过正,党内先后出现“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攫取了党中央权力,“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比前两次更左,更多理论的装饰,迷惑性更强,气焰更盛,时间更长,危害更大。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造成的危害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白区党的地下组织的瓦解,也包括苏区的全面溃败;既包括干部工作中大搞宗派主义、“肃反”扩大化,又包括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既包括土地革命中的“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的极左政策,又包括军事方针上的进攻中表现的冒险主义、防御中表现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表现的逃跑主义,并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5.2 遵义会议及时终结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地位

历经1921—1935接近14年的磨炼,中国共产党人已逐渐走向成熟,表现在通过强调党的领导和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关于强调党的领导,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以政治局决定的形式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发难,迫使后者放弃错误立场。关于实行民主集中制,表现在政治局成员充分利用党章赋予的民主权利,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就会议主题进行充分酝酿,会议期间虽然出现激烈交锋,但最终还是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解决了党内的严重争端,同“左”倾教条主义者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意味着党和红军破茧成蝶,涅槃重生。

6 “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无敌之境

6.1 积极建章立制

红军长征之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作风要求已基本形成。长征初期,红军总政治部便发布与长途行军与战斗相关的政治指令,指出必须“坚决与脱离人民群众、破

坏纪律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对于不适宜进行教育的破坏纪律的严重坏分子,应给予严厉处罚”。进入贵州地界后,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政治指示,指示各部队“务必加强队伍纪律检查工作,注重分时段分区域检查纪律、开展斗争,迅速克服一切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行为”。此后,红一军团又向所辖各部队下发关于入城后执行相关政策的规定,要求“原则上除政治、保卫机关及师以上的政治部外,其余部队不得进城”,从而尽可能减少对普通市民生活的扰动。1935年9月,中央红军抵达陕甘两省回族聚居区,颁布了回民区域政治工作的相关文件,明文规定“保护回民宗教信仰自由,不得擅自闯入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损坏《古兰经》等器物”“各部队在回民聚居区不得吃猪肉等禁忌食品”等^[2]。

6.2 严格贯彻执行

制度的制定只是第一步,关键是落实落地。1934年11月,红军《红星》报报道某战士组织纪律观念淡漠,擅自行动,造成严重后果。上级机关发现后及时审查后批准处决;某连指导员因偷拿土豪家里的粮食换东西,并擅自没收土豪财产,被撤职并罚参加劳动教育。之后,《红星》报又相继刊载了几个违反纪律被严惩的案例^[2]。联想到长征前夕在苏区被处决的谢步升和长征胜利后在延安被枪毙的黄克功,党和红军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应该是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由此才锻造了一代铁军。

综上所述,与其说“六个始终”是一个大党的必备素质,不如说正是做到了“六个始终”,中国共产党才最终成为一个大党。历史已经证明,长征的胜利不是偶而是必然,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实力。“六个始终”既是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也是对红军长征胜利经验的科学总结,“六个始终”是长征胜利的核心密码,也是党的强大基因。只有做到“六个始终”,才能既在身处顺境时保持清醒,又在面临逆境时更加坚定;才能胸怀千秋伟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 [1] 蒋建农.长征改变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
- [2] 马立强.红军在长征期间的纪律建设[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10-24.

作者简介:王以第(1971-),男,中国山东寿光人,硕士,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通讯作者:沈浩(1984-),男,中国山东郯城人,博士,副教授,从事党史党建研究。